

城市与社会译丛

王 笛 著 李德英 谢继华 邓 丽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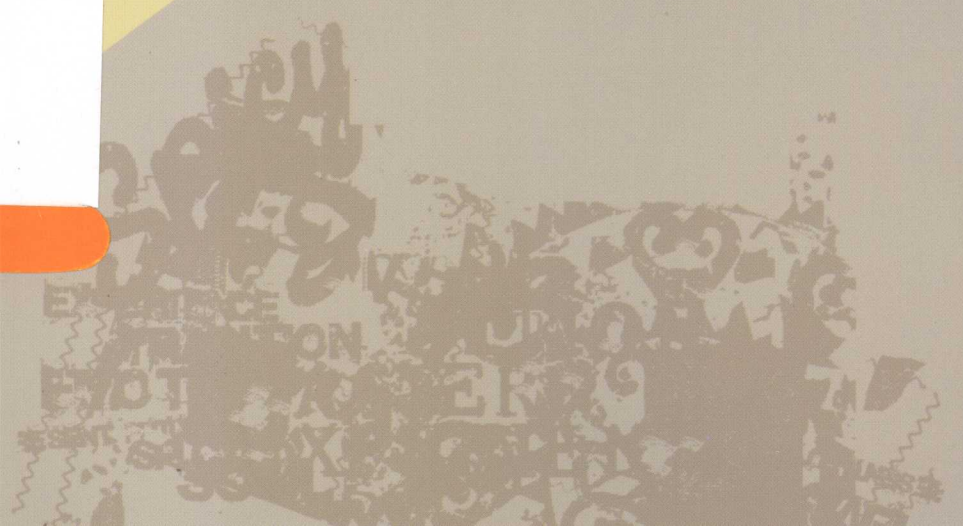
街头文化

JIETOU WENHUA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
与地方政治 (1870~1930)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013037002

C912.81
23-2



城市与社会译丛



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
与地方政治 (1870~1930)

王 笛 著 李德英 谢继华 邓 丽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C912.81
23-2



北航 C1645449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
(1870~1930)/王笛著；李德英，谢继华，邓丽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城市与社会译丛)

ISBN 978-7-100-09598-3

I. ①街… II. ①王…②李…③谢…④邓…

III. ①成都市—地方史—史料—1870~1930 IV. ①K297.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52162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城市与社会译丛

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王笛著

李德英 谢继华 邓丽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ISBN978-7-100-09598-3

2013年3月第1版

开本 640×960 1/16

2013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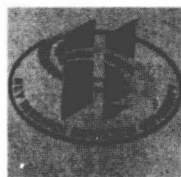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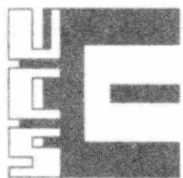
印张 28.75

定价：45.00元

本译丛为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都市文化 E-研究院

规划项目



主编：孙 逊 杨剑龙 陈 恒(执行)

编委：薛 毅 詹 丹 宋莉华 刘旭光 洪庆明

《城市与社会译丛》弁言

一、城市研究(Urban Studies)是一门新兴的前沿学科,主要研究城市的起源、发展、嬗变以及这一进程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目前已出现了众多与这一领域相关的学科,如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城市政治学、城市人类学、城市地理学、城市生态学、城市气象学等。从广义上讲,上述学科都可以归入城市文化研究(Urban Culture Studies)这一范畴。可见城市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跨学科性,它综合各门人文科学的优势,吸收不同的观念与方法,以独特的视角研究城市文化的历史、现状与未来。而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时期,城市化的速度越来越快,伴随这一进程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因此这一研究不但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着现实关怀的实际意义。因此,翻译一套城市文化研究丛书实属必要之举。

二、城市是一个个不断发展的文化载体,城市一经出现,其内涵也就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就这个意义而言,城市的诞生也就意味着城市文化的诞生,城市文化随着时代的嬗变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流光四射,因而研究的方法也多种多样,切入的角度也各不相同。放眼城市研究,比较成熟的研究属于城市社会学、城市历史学、城市人类学这三大学科,三者自然也就成为城市研究的三大支柱,这也是我们这套丛书选题所特别关注的。

三、根据我国城市研究的现状,拟将本丛书分为两个系列,即大学教材和专题研究,便于实际教学和深入研究。为了给广大读者奉献一套国内一流的城市与社会译丛,我们既定的编辑出版方针是“定评的著作,最佳的译者”,以期经受得住时间的检验。在此,我们恳请各位

2 街头文化

专家学者,为中国城市研究长远发展和学术进步计,能抽出宝贵的时间鼎力相助。同时,我们也希望本译丛的刊行,能为推动我国的城市研究和学术薪火的绵延传承略尽微薄之力。

编者

2009年10月30日

中文版自序

本书英文版是2003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虽然问世刚刚一年多,欧美学界便已经发表了不少书评,包括《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亚洲研究评论》(*Asian Studies Review*)、《中国政治学刊》(*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跨学科历史杂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加拿大历史学刊》(*Canadian Journal of History*)、《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宗教的社会科学档案》(*Archives de Sciences Sociales des Religions*)、《社会史》(*Social History*)等,对本书给予了积极的评价。学者的积极评论当然是对我努力探索的鼓励和奖赏,但也有持保留态度的,如《太平洋事务》(*Pacific Affairs*)上的一篇书评虽然指出:“在过去十年,关于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城市的研究中一些被忽视的问题的探索有了稳步发展。王笛对内陆省份四川成都的研究便是这个令人鼓舞的新趋势的最新成果之一。本书的杰出之处在于,他力图从下层民众的角度去揭示这一时期的城市转型。”但这篇评论同时也认为“王笛给予了成都街头文化一个浪漫的图景”,并指出“王笛为成都失去传统的街头文化而惋惜,但是值得怀疑的是,所失去的世界是否像王笛所描绘的那么迷人”。^①一本书会引起各种不同的反应是十分正常的,无论是赞誉还是批评,我以为学界予以重视,便是极大的成功。现在中译本即将出版,作为本书作者,当然也希望能得到国内学者的认可,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有批评,这也是我所期待的。

^① Review by Michael Tsin, *Pacific Affairs*, 2004, no. 2, pp. 325 - 327.

2 街头文化

其实,虽然我在本书讨论了传统城市的社区自治和自我控制,但并未描绘一个“浪漫的图景”,因为正如本书所证明的,这是一个既有“和谐”亦存在阶级、族群隔阂和冲突的社会(见本书第六章)。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太平洋事务》的这位评论者的确体会到了我书中流露的一种情绪。虽然本书是研究过去的历史、社会和文化,但我却有着现实的关怀。成都像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每天都在发生变化。不可否认的是城市的面貌更加“现代化”了,从林立高楼到辉煌广场,从豪华饭店、酒楼、美国快餐连锁店到超大广告显示屏幕,白天到处是熙熙攘攘,晚上是灯红酒绿。人们的居住条件也有了极大的改变,各种新式住宅如雨后春笋,从拔地而起的高楼到美国式花园洋房。就在这一派繁荣的背后,一个个古代的城市就在我们的眼前一天天消失了。现在,我们从南到北旅行,无论是大都市还小县城,格局几乎是大同小异,中国城市过去由于地理、历史和文化形成的各自的城市外观和特点,幸存无多或几乎不复存在。尽管一些城市象征性地保留了一点儿旧城、旧街和旧建筑,但在宽阔大道和繁华高楼的衬托下,无非是不和谐的点缀而已。当我参观日本奈良、京都和法国巴黎、里昂等城市时,那些几百年前的古朴街巷和社区仍然保留完好,在里昂一些居民仍然住在15—16世纪的石头房子里。那些旧城和古建筑可以说是这些国家最宝贵的遗产。甚至在我工作的美国得克萨斯的大学城(College Station)附近,若干19世纪中后期修铁路时留下的铁皮或木板破房子,现在也被仔细地维修,列为“历史区”(historical district),加以认真保护。我经常在遐想,如果成都城市还保留新中国建立初期时的格局(尽管民国时期遭受到破坏已经不小),只是在周边另筑新城,那么成都可以说不亚于京都、奈良的旅游胜地。但可惜的是,这已经成为永远的梦。我只好通过这本书从一个侧面来重构这个已经消失的城市,来寄托对这个古都的怀念。

在这个研究中,我没有对20世纪初以来的现代化的城市重述抒写更多的溢美之词。其实现代化带给人们的积极结果所论

甚多。^①我于1993年在中华书局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2001年再版,台湾五南图书2002年繁体版)对现代化也是赞誉有加,无须我再费笔墨。本书的考察角度与此前的研究成果颇为不同,我力图把人们的注目焦点从精英转向民众,从沿海转向内地。另外,过去有关社会变化的研究总是以精英为出发点,那么换一个角度,即从民众的角度来观察现代化和城市变革,也是十分必要的。本书是以中国内陆城市成都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公共空间、下层民众、大众文化和地方政治的关系。研究近代中国城市史的专家们大多把注意力放在沿海地区,我们对腹地城市日常生活仍知之甚少。我希望通过这个研究来进一步拓宽和深入我们对中国城市史和文化史的理解。这个研究以“街头文化”作为中心,展示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从城市的外观、民间艺人的表演到民众谋生的方法以及对街头的争夺等。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有着紧密联系,他们创造并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然而当改良者试图对街头的使用进行控制时,便引起了下层民众为其生存空间的斗争。随后在革命运动中,民众又以街头作为政治反抗的舞台。在民国初年的政治动荡中,民众和精英为共同利益而合作,组织自卫活动捍卫他们的生存,同时也是维护他们的传统生活方式。

在中文版即将出版之际,想借此机会谈谈有关本研究写作的一些思考和片断回忆,或许这些思考和片断回忆可以对读者理解本书有所帮助。另外,对本书的翻译本也要作一些必要的交待。

叙事和用语

在目前的历史作品的表达中,无非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复杂的分析,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卓越的

^① 其实我在本书中虽然强调了传统中国城市的自治,但同时也揭示了城市社会生活中存在的冲突(请参看第六章),因此并没有刻意渲染“一个浪漫的图景”。

4 街头文化

分析能力,他们能把读者引入一种意想不到的境界,发现如此简单问题的后面竟然埋藏着这么复杂的玄机。这种方法即我们现在常说的“话语分析”(discourse),这个倾向也逐渐从西方进入中国的学术领域,日益受到学者们的青睐。这个倾向可以从那些“后现代”的作品中清楚地看到。但这些作品一般是写给在“象牙塔”中的专家看的,其所用的许多复杂理论和术语经常使普通读者如堕五里雾中,以至迷失了方向。另一种倾向是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力图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理论和术语,其目的是不仅使本领域的专家,而且其他领域的学者,甚至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而且喜欢看下去。因此持这个倾向的史家主要采用的是“叙事”(narrative)的方法。如果说“话语分析”是把读者置于所分析“事件”之外,观看作者怎样熟练地把一个整体原子化,从而各个击破,使观者看到了从事物外面所看不到的“精妙”的内部,那么“叙事”方法则是力图把读者引导进入“事件”内部,让他们“身临其境”来对“事件”进行观察。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可以说是把这种方法用到了极致的一位历史学家。

无须解释,这两种方法各具优劣。据我的观察,虽然“话语分析”在西方学术界日益流行,但美国历史学——无论是美国史、欧洲史还是东亚史——仍然是“叙事”方法居主流地位。从我个人的研究来讲,显然接近后一种方法,这当然与我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所受的学术训练有关。在我写作这本书之初,我就想使本书能吸引更多的读者。虽然这是一本学术著作,但我竭力使其具有可读性,使读者从书中所讲述的故事去体会我试图表达的东西。从一定程度来讲,我的这个目的是达到了。^①

^① 一些读者可能会感到本书的注释过于冗长,为了避免使正文过于繁复,我把有些事例、资料和讨论放到注释中。就像《尼瓜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的作者、人类学家C. 吉尔兹(Clifford Geertz)在其书中所说,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不同的读者可以采取不同的读法。一般读者可只读正文以免过于枯燥,而那些想刨根问底的本领域专家或对本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则可从注释中得到更完整的学术讨论。见 *Negara: The Theatre State in Nineteenth-Century Bal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0)。

在西方有关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有些词经常出现,但在中文中却缺乏对应词,因此这些词在英文中很容易理解,但翻译成中文则有可能产生歧义,如本书经常提到的“late imperial”(或 late imperial China)、“pre-modern”、“early modern”以及“elite”等。“late imperial China”在国内经常被错误地翻译成“晚清”,而实际上指的是从宋代到清末这样一个漫长时期,在本书中一般翻译为“晚期中华帝国”,尽管这是一个有点儿西化的表达。“pre-modern”直译中文是“前现代”,而这在中文中很容易引起歧义。这里的所谓“前现代”,是“现代(或近代)之前”,是指在一个国家或社会“现代”之前的历史,有“传统”、“过去”、“古代”之意,但又不完全相同。^① 本书的翻译则根据具体语境而定。而“early modern”在英文中也是一个含义模糊的表达,是指“早期近代”或“近代早期”,在中国史研究中一般是指18—19世纪甚至20世纪初,中文翻译也只好根据内容和上下文而定。

“精英”(elite)在本书中经常出现,虽然我在英文版的导论中对此有解释,但有必要在此多说几句。在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elite”是一个常用词,该词在中文中没有完全对应词,一般翻译为“精英”。目前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著作中也常用“菁英”。但“elite”一词的范围远比“精英”广泛得多,它包括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大中小地主以及其他全部在地方有财富、有权力、有影响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哪怕他们的财富、权力、影响或教育也许很有限)。在没有其他更好的中文词来表达的情况下,这里姑且译做“精英”,但应该注意这里的“精英”与我们经常理解的政治和思想精英分子有极大区别。

本书重点研究的是“公共空间”(public space)和“公共生活”(public life),而没有讨论“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因为这并不是本书的出发点,但或许本课题的研究可以为这个问题的深入讨论提供一个个案思考。如果说J.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的 public sphere 主

① 如“前现代”只是一个时间概念,而“传统”既是时间概念,也是一种文化概念。

要讨论的是一种社会和政治空间,^①我在本书中主要考察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物质空间”,即城市中人们日常使用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空间,研究在这样一个空间中,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是怎样从事他们的日常生活,以及这种日常生活是怎样与地方政治联系在一起。本书虽然没有直接对“公共领域”问题进行讨论,但实际上仍然是要解决“物质”的公共空间是怎样演变成为社会和政治空间的。也就是说,我们不用哈贝马斯 public sphere 的概念,而采用歧义较少的“公”(public)——这个在中国存在已久——的概念,与英文中的“public”一词相对应,仍然可以在中国和西方不同的社会、历史和语境中进行比较和交流。^②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张信在其书评中指出:“《街头文化》是在这场关于‘公共领域’的讨论中成书的。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一再考虑了有关方面的问题,最终选择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的城市社会,即从公共空间的形成、运作和发展的角度,于是找出了城市文化变更之关键。城市文化是由各阶层特别是市民百姓所创造和促成的,而街头文化正是城市文化之最重要一部分,从这一点上来说,《街头文化》是对‘公共领域’的一种修正,而这一修正将人们的着眼点移到市民阶层上来了。笔者认为,这是该书的最大贡献。”^③至于他的评价是否恰当,还是由读者自己去判断吧。

这里顺便交待一下关于资料的使用问题(这个问题我在本书导言中作了系统阐述)。我在不少地方做过关于街头文化研究的学术报告,每次总有人问我依赖的是什么资料,因为这是如何研究大众文化和下层民众所面临的困难。的确,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关于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描述,基本上都不是由民众自己来叙述的,而是由精英来记录的,也就是说经过了精英的过滤。由于我们所看到的大众和大众文

① Jürgen Habermas, *The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An Inquiry into a Category of Bourgeois' Society*. Trans. by Thomas Burger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9).

② 关于“公”的概念在中国的发展演变,参见 William Rowe, “The Public Sphere in Modern China,” *Modern China*, 1990, no. 3, pp. 309–329.

③ 见《历史研究》,2004(2),188页。

化基本上是透过精英的眼睛,我们在研究它们时便不可避免要回答这样的问题:下层民众是否能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能不能代表他们自己?微观历史的代表人物 C. 吉兹伯格(Carlo Ginzburg)写的《奶酪与蛆虫》(*The Cheese and the Worms*)中提出,在所记载的资料中,下层民众从来就没有自己的声音,他们的思想和意识全是由记录人来写的。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些资料,这些记录下来的文字,实际上是已经被扭曲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真正的声音,大众文化也是强加在下层民众身上的文化。因而研究下层人民的学者 G. 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了到底下层民众能不能讲话,发出自己声音的疑问。^①但是通过我自己的研究,我认为他们是可以讲话的,他们是有声音的,但这取决于从怎样一个角度去使用这些记录下来的资料。

在作研究的时候,用什么口气来描述对象是很重要的。^②这就是说,所描述的对象本身“是”这样的呢,还是所描述的是通过别人的眼睛和头脑所“反映”出的面貌。另外,我们在研究下层民众的大众文化的时候,感觉很难找到详细和具体的描述,因为精英并没有或不屑对它们浪费笔墨,所以他们所涉及的大众文化和下层民众,大多是比较抽象的批评。然而在研究下层民众的时候常常需要很具体的描述,那么怎样去寻找,去哪里寻找?西方已有学者开始把眼光放到文学的资料上,比如明清以来的地方谚语、民间文学、地方戏曲以及诗词等,都可以作为史料来使用。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很鄙视文学资料,认为它们不可靠,因为经过了人们的想象和再创造。但是我认为,关键在于使用文学资料的时候,采用怎样的方法。例如本书使用了大量的竹枝词,这些竹枝

^① Carlo Ginzburg,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Trans. John and Anne Tedeschi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2);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Can the Subaltern Speak?” 217–313 in Gary Nelson and Lawrence Grossberg, eds.,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8); Gail Hershatter, “The Subaltern Talks Back: Reflections on Subaltern Theory and Chinese History,” *Positions*, 1993, no. 1, pp. 103–130.

^② 几年前我曾讨论过怎样“读”资料的问题,见王笛:《大众文化研究与近代中国社会——对近年美国有关研究的述评》,《历史研究》,1999(5)。

词是由成都地方文人创作的,记录了他们所见到的社会和日常生活,比如民众怎样在街头从事商业、谋生、人际交往、庆典等活动。在运用这些资料时,我并不宣称这便是真正的、准确的、大众的日常生活记录,而是反复强调这是这些精英所看到和理解的大众、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从中探索精英对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的态度以及演变。因此在研究下层民众和大众文化时,我们完全可以在资料问题上扩展我们的视野,并换一个角度来考察我们所研究的对象。

这里还要强调的是,视觉资料为我们研究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因此本书尽可能地收入了不少照片、漫画以及民俗风情画。这些视觉资料可以起到“让资料自己说话”的效果。虽然我们在用文字资料时应该尽量使用自己的语言和提供自己的解释,避免“让资料自己说话”的“懒汉”式的研究方式,但本书所提供的这些视觉资料,都可以与文字分析相印证,从而加强我们对街头文化的理解。本书英文本共收入 59 幅插图,这个中文本又增加了 54 幅,总共 113 幅插图。另外,我又加入了几幅我收集的成都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的老地图,放在正文之前以作为读者参考。

宏观与微观

我也想趁此机会谈谈我这些年来研究历史方法和史学观的一些转变。我在 1989 年完成,于 1993 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是对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的系统研究,涉及生态、人口、耕地、城市网络、贸易、经济结构、文化、社会生活、宗教信仰等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区域性的宏观研究。从这个十多年前的研究中,读者可以明显看到我所受两大史学思潮的影响:一是以布罗代尔为代表的法国年鉴学派,一是现代化理论。前者尤以布罗代尔的《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对我启发甚多,后者则以布莱克的《现代化动力:一个比较研究》使我获益

匪浅。^① 在年鉴学派影响下,那本书虽然篇幅很大,但研究对象基本集中在从生态、人口到社会经济、组织和文化上,对政治事件涉及甚少。如果说年鉴学派对我选择研究对象作用甚巨,那么现代化理论则使我能够把如此丰富的资料和复杂内容统一于一条贯穿全书的主线。

这里应该说明,与许多现代化问题研究者不同的是,我并不认为传统与现代化(在那本书中我采用的是“近代化”)是完全对立的,正如我在“导言”中所表明的:“我们不能把近代化视为从传统到现代化中间的一场简单的转变,而应将其视为从远古时代到无限未来连续体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传统和现代并不是一对截然分离的变量,而是由两个极点构成的连续体。因此严格地说,传统与现代化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因此,该项研究是以“动态的眼光看待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的。^②

由于这样的构想,我避免了在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很容易出现的偏向:即把晚期中华帝国或早期近代中国,视为一个停滞的社会,这正是西方和中国史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从黑格尔的“一个无历史的文明”之说,到马克思“密闭在棺材里的木乃伊”之形容,还有马克斯·韦伯所谓中国“没有形成一个成熟的都市共同体”的论断,以及中国史家“闭关自守”之论证,无一不是这种认识的反映。^③ 然而在该书的论述中,无论从农业经济、传统手工业,还是从区域贸易、城市系统与市场网络,以及教育、社会组织、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都可以看到这种发展,

^① Fernand Braudel, *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in the Age of Philip II*, two vols. Trans. Sian Reynolds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2); C. E. 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 A Study in Comparative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67).

^② 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8页。

^③ 还包括像孟德斯鸠、穆勒等欧洲启蒙时期的思想家。黑格尔的“一个无历史的文明”(a civilization without a history)其意思是指中国总是王朝兴替,周而复始,没有进步。他这里所称的“历史”是指历史的“发展”,而非我们一般理解的“过去的事”。

证明即使是在长江上游这个中国相对封闭的区域,仍然存在着发展的内在动力,而社会从未停止过它的演化。

不过,也必须承认,当我在进行该项研究时,主观上并未把“停滞论”作为自己所要论辩的对象,而且该书是在现代化理论影响之下完成的,其宗旨是探索一个传统的社会是怎样走向近代化的。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因而把传统的丧失和现代因素的出现都视为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并给予这种发展积极的评价。换句话说,该项研究是从现代化精英的角度来看待社会变化的,把主要注意力放到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上。研究地方精英,无疑是了解清代长江上游的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好窗口,然而这个角度也制约了我在该书中语言的使用,用目前比较时髦的话来说,是接受了精英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和“话语”(discourse)。例如在讨论大众信仰、民风民俗时,所使用的“迷信”、“懒散作风”、“惰性”以及“不良社会风气”,都是当时地方精英批评下层民众的常用语言,而我在使用这些带价值判断的词汇时却未作认真辨析。

《街头文化》的英文版是2003年出版的,距《跨出封闭的世界》的出版已经是整整十年,它反映了我的学术兴趣、学术观念、学术方法极大的转变。^①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是从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变化的话,那么《街头文化》则是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虽然《跨出封闭的世界》也观察了普通民众,但并未对他们予以足够的重视),即注重传统的价值,并把下层民众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而且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在分析社会演变时,我更加注意下

^① 我关于大众文化和下层民众的其他研究还包括:“Street Culture: Public Space and Urban Commoners in Late-Qing Chengdu,” *Modern China*, 1998, no. 1, pp. 34 - 72; “The Rhythm of the City: Everyday Chengdu in Nineteenth-Century Bamboo-Branch Poetry,” *Late Imperial China*, 2003, no. 1, pp. 33 - 78; “The Struggle for Drink and Entertainment: Men, Women, and the Poli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14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Chicago, January 9, 2000; “The Idle and the Busy: Teahouses and Public Lif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engdu,”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2000, no. 4, pp. 411 - 437.